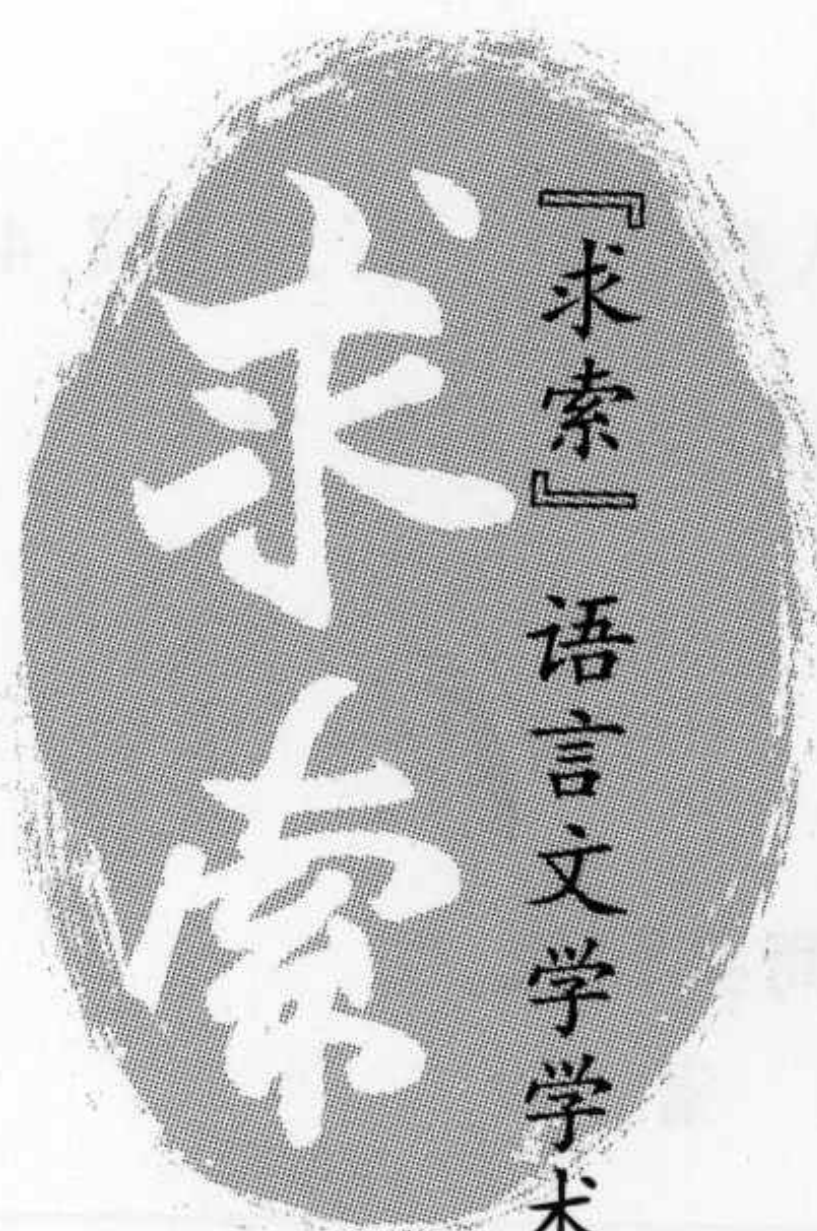


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

WUJIN JUSHI ZHANG SHANGYING YANJIU

罗凌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峡大学文学院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任:刘德富

副主任:李建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新	王前程	邓新华	田 斌
刘月新	吴卫华	陈和春	李建国
张 朔	范 军	赵 宏	胡绍华
段 维	曾 巍		

总序

王先霈

三峡大学文学院组织出版“‘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整体地展示本院教师最新的重要学术成果，第一批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即将面世。这是他们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学院领导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构想和当前的进展，嘱咐我就此写一点文字。我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及其前身宜昌师专中文系的多位同行交往几十年，对学院的发展轨迹有所了解，可以借此谈谈我对这个学术团队的观察和由此而生的感想。

从宜昌师专所在的北山坡，到今天三峡大学的葛洲坝与三峡大坝近边依山傍水的主校区，地理距离并不远，而几十年来几代人所经历的创业历程，却是并不平坦单纯，而有着十分丰富厚重的内涵。在学科建设中，传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无形的力量，文科尤其如此。没有相当时间的积累，一个学术团队不可能于朝夕间突兀而起，更难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宜昌师专中文系的老师们，是一批非常敬业的园丁，倾注心力于教学，同时也在各自选定的领域学有专攻，功力扎实，学风朴实，撰写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著，带出了一批批后继学者。本丛书的作者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今正是治学的黄金年龄。他们曾分别到国内多所大学攻读学位、进修和访学，既仰承本校先行者们的纯朴作风，又广泛吸纳校外、省外和国外多种学术营养，最近十年左右，陆续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都有稳定的学术方向，从我十幾年来的接触，从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不难看出他们在求索之途跋涉的清晰脚印，而本文库里的专著则多是作者在稳定方向上的新成果。我比较赞赏稳步渐进的治学方式，我以为，

《荀子·劝学》说的“螭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无定向，常常导致学无定见。趋时跟风，可以煊赫于一时，最终则消歇于长久。治学首先是个体独立的精神劳作，求索者要准备着经受孤独。但这绝不是主张单兵独人各自为战，恰恰相反，在一个院系、一个专业里，大家都应有整体意识，有学术上的交流、交融和碰撞。然而，也只有各人有专攻、有特长才能有效地交流、交融和碰撞，交流、交融和碰撞必须建立在大家各自独立思考和张扬学术个性的基础上。本文库的作者们，分属若干二级学科，就我的了解，其中，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力量较强，而语言类和文学类彼此呼应，有竞争更有协作。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的配合相当重要。在自然界，物种多样、结构多层的环境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在一个院系，所属二级学科既要有重点，又要有相对的和动态的均衡发展，这才有利于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各个学科和各个成员适应当代社会的急速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三峡大学文学学院的进步，与他们学术生态的合理是大有关系的，这套文库将有利于他们学术生态的进一步合理化。

现在看到的收入文库里的第一批著作，其学术含量彼此还是有些区别的。这也使我们可以期望，后续的作品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文库以“求索”为名，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术之路是无尽的，学者生命的价值在无休止的探求之中，最灿烂的明珠永远在我们的前面闪耀。

2007年3月26日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张商英与世俗政治	(5)
第一节 张商英时代的政治背景	(5)
第二节 张商英的仕宦生涯	(7)
第三节 张商英的政治倾向	(10)
第四节 张商英的政治品质	(25)
第二章 张商英与道教	(29)
第一节 张商英时代道教发展概述	(30)
第二节 张商英的道门交游与道教实践	(32)
第三节 张商英的道教著述以及文献整理	(40)
第四节 张商英的道教修养及贡献	(46)
第三章 张商英的佛学修养	(55)
第一节 张商英的佛界交游	(59)
第二节 张商英的禅悟	(75)
第三节 张商英的佛教著述及成就	(92)
第四章 张商英与宋代护法	(107)
第一节 张商英时代的排佛活动及护法概况	(107)
第二节 张商英的具体护法活动	(112)
第三节 考辨宗门系统	(122)
第四节 《护法论》、《续清凉传》与护法	(126)
第五节 张商英护法的意义	(143)
第五章 张商英与三教融合	(147)
第一节 北宋三教融合综论	(147)

第二节	张商英崇信三教融合的原因考察·····	(152)
第三节	张商英三教融合思想的进程及三教主从地位·····	(160)
第四节	张商英三教融合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167)
第六章	张商英著述详考·····	(169)
第一节	张商英传统著述考·····	(169)
第二节	张商英诗歌辑考·····	(188)
第三节	张商英文赋辑考·····	(213)
第七章	张商英对后世的影响·····	(225)
第一节	对张商英的批评与反批评·····	(225)
第二节	张商英轶事遗迹对民间的影响·····	(236)
附录	张商英事迹及著述编年·····	(242)
参考文献	·····	(311)
后记	·····	(319)

绪 言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人,早年追随王安石主持的熙丰新政,大观、政和年间作为宰辅绍述新政,是新党的代表性人物。他能秉忠直言,屡屡与新党权力核心发生冲突,一再被贬斥,颇有“忧国而不惜官”的贤士风范。他自幼学习儒学,早年沾染道风,中年开始向佛,禅学修养较高,最终得以列入黄龙派兜率从悦禅师的法嗣,是北宋佛教最得力的外护居士。他主张三教融合,推动了宋代三教融合的发展。他整理了儒、释、道三家的一些文献,有七部编著文献及一系列诗文存世。

南宋理学勃兴之后,一直到清代,理学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张商英的思想本来不属于理学系统,所以后世对张商英的评价普遍较低,有一些舆论甚至由此诋斥其人格,企图全面否定张商英,以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不怎么研究张商英在新政中的政治才能,文学研究不关注张商英的文学成就。倒是宋以来历代高僧相当看重张商英的佛学修养,推尊他为宗门有力的护法居士,各种佛史禅灯中多有记载。但是,“我国佛教研究的不足在于:微观的研究不够,主要表现在资料的整理、注释方面”^①。有关张商英佛学方面的研究同样薄弱。

迄今没有关于张商英研究的专著,单篇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比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仅有蒋义斌先生的《张商英〈护法论〉中的历史思维》、黄启江先生的《张商英护法的历史意义》以及日本安藤智信先生的《张商英〈护法论〉的背景》等几篇。对于张商英,黄先生以为,“大致上张商英可以说是一个颇有争议性(controversial)的人物”,“由于对张

^① 李富华等:《佛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

商英的褒贬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他予以重估”^①。其引用有 Helwig Schmidt-Glintzer 的一篇论文 (*Zhang Shangying—An Embarrassing Policy Adviser under the Northern Sung*),该论文称张商英事实上为一“廉洁”的谏臣,而且在当时民众印象中是“正直”的官吏,评价比较客观。其他多为介绍性文字,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各种禅宗史和居士佛教史中一般附带有张商英的概略性介绍,较为翔实的有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所著《中国禅学思想史》,分五节叙述张商英的禅学经历与修养,但侧重于事实描述,没有涉及禅学思想的具体分析;潘桂明先生所著《中国居士佛教史》有专门章节述及张商英与《护法论》,分析比较深入。

一个时代的研究必须基于大量的基础性个案研究的展开,大历史必须依托于小历史的具体研究,这样在整体性的综合判断上才更加有血有肉,不致流于主观臆断。同时,每一个科学、客观的个案研究,能以个别反映一般,其中亦可以透视出某些很有价值的规律性。张商英个人负载着纷繁的评价,然而历史上的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并且有可能是带有某种目的的记载。我们已无法还原张商英思想与行为的完全真实,但通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或可以重现张商英的部分本来面目。具体来说,对张商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一、政治层面

张商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内部新政势力与保守势力不断纠葛、外部强敌窥伺导致国力逐渐衰弱的时代。熙丰新政之后,新党与旧党的争斗更趋激烈,张商英在这个很难分清是非的政治大环境中登上政治舞台。他是熙丰新政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必然受到旧党无情的排挤与打击;同时,又很难说张商英是新政的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与新党权力核心的矛盾,又使其受到新党的排挤甚至贬斥。张商英执政的时间仅仅一年有余,但这段时间所颁布推行的国策方针基本上体现了其治国

^① 黄启江:《张商英护法的历史意义》,载《中华佛学学报》1996年第9期,第131页。

方略和政治理想,对于研究北宋后期政治有其价值。

北宋灭亡后,对张商英其人,评论纷纷,甚至有人推其为祸国乱世之尤,并大肆从人格上进行攻击。张商英的政治倾向具体怎样?他的政治品格究竟如何?他为什么被列入元祐党?他罢相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对其评价,为什么前后相差如此悬殊?他的人格应该怎样品评?在宋代历史上,他的历史功过应当怎样客观地界定?这一切疑问都可以构成研究课题。

二、思想层面

张商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佛家、道家思想不断渗透,儒家思想主流地位逐渐缺失的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其融合中蕴含着冲突,冲突中又体现出融合,构成一个思想角力的文化融合运动。宋代在家居士已经形成一股令佛界和俗界无法忽视的力量,士大夫居士这个身份即表现出其对于传统儒学所应负载的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尽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学在精神上、行为上的实际约束力,但文人士大夫的礼佛参禅却揭示了传统儒学逐渐失去吸引力的事实。同样,道教由外丹转向内丹,其吸引力骤增,不少士大夫由儒归道,并形成一种社会现象。面对这种思想冲击,士大夫居士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应该怎样调整统治政策和心性追求,也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

宋代文人士大夫为什么要逃儒归佛或逃儒归道?其归佛、归道的终极目的究竟何在?文人士大夫的归佛、归道对整个士大夫阶层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统治阶层调整佛教、道教政策有什么样的导向?他们在三教融合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士大夫居士应该怎样处理士大夫的风花雪月与佛、道二教清规戒律的关系?怎样处理儒家的“世间”与佛、道二教“出世”的关系?这些都是本研究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三、护法层面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一直伴随着毁佛灭法与护法传教的反反复复的矛盾斗争,宋代佛教发展的独立性最终屈服于世俗皇权并借世俗权力作为外护,佛教就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艰难地传承发展。张商英主动揭扬护法大旗,他的护法理论以及行动,不仅在佛教史上有其意

义,而且在思想史上亦有其研究的历史价值。张商英的护法理论有什么新异之处?他的护法理论吸收了前人哪些长处?同时又有怎样的缺失?张商英是怎样融合当时的儒、佛关系的?他以士大夫居士身份倡导护法,对士大夫阶层有何影响?张商英的积极外护在居士佛教史上应该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四、文学层面

张商英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其诗文集受历史的汰选而最终湮没不存,然而,在各种文献的零星记载中,我们尚可见到其近两百首诗词和一百多篇文赋、奏议。《全宋诗》和《全宋文》编辑张商英的诗词文赋时有部分漏略,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再行辑佚考释,以补《全宋诗》、《全宋文》之缺。

古典文献的研究强调科学性、客观性,但由于传世文献的繁杂以及不足,研究中便无法避免主观的价值判断。掌握尽可能丰富的材料,让文献史料自己说话,无证不立,同时不隐藏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证据材料,这是本书的立足点。

本书主要利用文献整理研究的方法,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宗教研究的方法甚至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具体以张商英个人作为研究的核心,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宗教文化背景、哲学思想背景,从多向角度展开分析研究。研究政治人物,梁启超认为:“另有许多人,虽没有什么特别伟大,但事迹隐没太甚,不曾有人注意,也该专为他作传表彰。”^①张商英正是这样一类被“隐没”的人。除了成功之外,张商英尚有不少缺点,我们不要单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张商英的失败同样有其研究价值。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民国丛书》第一编(七三),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2页。

第一章 张商英与世俗政治

整个北宋中后期是一个由相对强盛逐渐走向衰败覆亡的时期。当然,统治阶层并没有坐视专制王朝的没落,反复的新政,曾经为腐朽的统治描画出短暂的新鲜气象,但终究没能挽救北宋王朝的覆亡。张商英漂泊坎坷的一生贯串了整个北宋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尤其是他五十多年的仕宦生涯本身就交织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纷争与动荡中。因此,从张商英个人身上,可以发掘出当时社会发展与社会个体相互影响的一些内在规律。

第一节 张商英时代的政治背景

宋仁宗时代是北宋相对鼎盛的发展阶段,但早在真宗后期,内忧外患已经铸成北宋政权积贫积弱的痼疾。张商英出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王朝已经拥有八十多年相对承平的历史。但是社会矛盾并不因为承平日久而趋于缓和,而是逐渐积聚为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危机,宋仁宗时代日渐凸出的冗官、冗兵、冗费等弊端,已经事实上危及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为仁宗采纳,号称“新政”。但是范仲淹等人带有浓厚温和改良色彩的新政还是刺激了强大的保守派官僚集团,在保守派的高压下,持续仅仅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很快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对于尚在襁褓的张商英不可能有任何实在的影响,但是这次新政对因循守旧趋于僵化的社会思想是一次强烈冲击,其潜在的社会影响则不言而喻。

治平三年(1066年)宋英宗提出“去冗官之患”的治世主张,改革措施尚没有全面铺开,次年英宗便病死。同年赵顼即位为神宗,锐意除旧

布新,以摆脱积弊而富国强兵。熙宁二年(1066年)二月,王安石主持的熙丰新政正式拉开序幕,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取得宦官、外戚甚至后宫的支持,全方位猛烈攻击、破坏新法,逐渐动摇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全力支持态度,从而引起新党内部的分化。曾布首先倒戈反对市易法,迫使王安石罢退。尽管随后韩絳代相,吕惠卿由王安石荐举任参知政事,但韩、吕二人遇事不合的分歧态度为新法的推行设置了不少障碍。熙宁八年王安石恢复相位,已经不复有当年神宗的诚心信用,又受吕惠卿疑忌,次年便获准请辞,归息家园。熙丰新政勉强推行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主张新法的执政大臣蔡确、章惇罢职,司马光出为尚书左仆射,不论新法好坏利弊,一概罢废,实施所谓的“元祐更化”,并贬死蔡确,发新旧两党残酷倾轧之开端,同时引起旧党迅速分裂,程颐之洛党、苏轼之蜀党、刘摯之朔党各执己见,朝政纷纷扰扰,莫衷一是。

高太后的去世使旧党丧失了强力支持,哲宗亲政之后,新党人物纷纷起复,章惇出任左相,新党在哲宗的授意之下重新控制朝政,由此展开对旧党的反击,逐步恢复新法。但新党在贬窜旧党的同时,再度分化:曾布攻击章惇援用小人,专恣弄权;曾布疑忌蔡卞;李清臣与章惇议事不合等等。

哲宗早逝,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身份“权同处分军国事”,一仍高太后之例,反对新法。曾经为新党中坚的曾布不顾章惇提出的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告诫,以议立端王赵佖受向太后信用,并联络韩忠彦合力打击章惇。结果蔡京乘虚而入,开始他二十六年的专权。蔡京勾结宦官童贯,以“绍述”为名,将新法肆意篡改为搜刮敛财的法门,聚天下财货于京师以夸富盛固宠,鼓动徽宗铸九鼎、制礼乐、建明堂,粉饰太平,兼之徽、钦二帝耽于享乐,“天子不仁,不保四海”^①。同时,新党在防范旧党东山再起的同时严厉排斥异己,擅权纳贿、卖官鬻爵,北宋

^① 《孟子》卷七“离娄上”,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8页。

政治陷入最黑暗的时期,直接导致靖康之变。

朝廷本意以新法富国强兵,但所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党争,耗掉了宋代统治阶层最后一点元气。治国方略的反复摇摆,中断了政策的延续性,加之新旧两党中部分奸邪之辈从个人利益考虑,搬弄是非,使新旧党争的性质更趋复杂化,严重破坏了专制王权的统治基础,导致士大夫官僚品格日趋沦丧,士风衰败,腐朽的北宋后期政治走到历史的尽头。^①

第二节 张商英的仕宦生涯

宋廷一改唐代士庶相争的门第之风,庶族寒门乃至一介布衣,以自己的才干就可以出将入相,这在宋代并非偶然现象。宋代文人士大夫尽管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但是,在中央君主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的情形下,文人士大夫的仕宦,一如海潮中漂浮的小舟,难以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因此,宦海中几番沉浮,可谓司空见惯。张商英五十年的仕宦经历,或低至摄洛县圉窑镇不入流的税官,或高至赵宋宰相;或散官各地,流落江湖;或直谏圣皇,应对宫阙;或失落哀怨,闭门寓居;或荣宠奋发,外抚内辅,其迭起迭落的宦海生涯,大致可以分作这样几个阶段:

一、初履县职

张商英是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按照北宋制度,凡进士及第,即具备选人身份,可以选官任职,意味着他经邦济国的仕履之途业已展开。据文献记载,张商英最早所领的职官应该是达州通川县主簿。但张商英任职通川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其他文献载录他治平三年春曾经任洛县主簿。治平四年,其父张文蔚去世,张商英回乡守制三年。熙宁

^① 本部分综述北宋中后期政治形态,主要依据《宋史》本纪以及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以及方豪、陈振分别所著之《宋史》。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宋辽夏金时期》,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振著:《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四年因为招降渝州叛蛮王袞,被辟知南川县。从治平二年张商英出仕到熙宁四年调离南川,张商英在地方卑职上耗费了七年时间,为他接触下层吏治以及了解民生疾苦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亲身体会。

二、初任台官

熙宁二年,新法的推行遭到保守派士大夫官僚的消极抵制,王安石被迫起用新进以贯彻新法实施。“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叶。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①熙宁四年末,张商英受章惇荐举,擢升为光禄寺丞、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旋即擢升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隶御史台察院,可以分察尚书六部及其以下百司之事,品位不高,但职责颇重。张商英自熙宁五年三月任察官到十一月降监荆南盐曲商税,八个月的时间,有大量弹劾及建言奏章。其以新进少年的锐意进取之心充台官、掌监察,绝无老成人之世故暮气。然而政治中的潜规则难以容纳其直言弹劾,张商英对新党集团伪滥行为的严厉抨击,与王安石的用人主张发生齟齬,最终以履行台官的本职而受降贬。这是张商英首次京官生涯,为其直言敢谏付出了贬出朝廷的沉重代价,与此同时,他在当时政坛留下了极富个性的台官形象。

三、沉沦下僚

从熙宁五年十一月张商英降贬监荆南盐曲商税,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复太子中允,提举京西南路常平,整整七年降贬荆南,是对张商英一次颇为沉重的打击,势必引起张商英无尽的思索,让他重新审视政治纷争中的波谲云诡。尽管元丰三年曾受诏除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一职,但马上因为事涉干请,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达五年之久,这样张商英在荆南蜗居了近十二年。元丰八年张商英被召为太常丞,随即旧党起复,实施元祐更化,全面清算、根除新党势力,他又被贬出朝廷为开封府推官等地方职,这一次散官各地耗掉张商英九个年头,但推官、提点刑狱以及转运副使等职务的替换,让张商英对地方吏治更加熟悉。直至

^①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迁任右正言,才结束二十多年沉沦下僚的仕履。

这个阶段张商英曾经两次入朝任职,但都极其短暂,根本没有作为,而绝大多数时间转官奔走于各地,故仍归为其仕宦的一个时期。

四、再入台谏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起复为尚书左仆射掌宰职,新党全面揽权,张商英立即由淮南转运副使迁任右正言,主宰言路。鉴于新党重臣蔡确受冤于“车盖亭诗案”,被贬死新州,新旧两党残酷的党争由旧党发端,接下来,旧党便遭受到新党针锋相对的报复性打击。

张商英依然故我,坚守台谏官独立言事的本职,攻击旧党不法的同时,弹劾新党中的伪滥成员,使曾布等人如骨鲠在喉。尽管有章惇的竭力维护,但这次台谏履任,最终还是以改监江宁府税而告终。

五、转徙各地

这一次张商英贬黜,比上次沉沦下僚的境遇相对优裕,因为章惇尚能稳固其相位,没有置张商英于不顾。张商英改监江宁府税不久权知洪州,即是明证。绍圣四年,由权知洪州改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这年十一月,张商英曾经入京,章惇曾有意让他出任贰卿,但被哲宗否决,依旧发还原职。不久由副使转为正职,直到元符二年(1099年)改任权工部侍郎,再一次回到朝廷。元符三年,改迁中书舍人,又转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但治河无功,贬知随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二月,入京任权户部侍郎。这七年的转徙生活实际上只是新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

六、出任执政

任权户部侍郎是张商英走近权力核心的一次契机,崇宁元年(1102年)八月,他自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迁中大夫,除任尚书右丞,次年迁左丞,相当于副相之职。但随即与蔡京处事不合,罢知亳州,又入元祐党籍,一度被褫夺仕籍,从此多年贬斥于外,寓居荆南宜都别业,这是张商英政治生涯的最低点。

七、绍述新政

大观四年(1110年)和政和元年(1111年)是张商英仕宦生涯的极

顶。在他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张商英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治世思想完成了一系列的纠弊反正措施,“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①,以挽救北宋岌岌可危的政局。这个时期张商英所绍述新政的方略是北宋政府最后一抹亮色,因为此后蔡京复相,北宋政事江河日下,病入膏肓,已经失去了疗救的实在意义。

八、罢相闲赋

罢相之后,蔡京一度对张商英多有防范。但张商英毕竟年事已高,壮心已老,不久被放归其别业。宣和三年(1121年),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在宜都终老,为他多舛而传奇的一生画上句号。

上面对张商英的仕宦生涯按照其履职的阶段作了大致划分,稍加概括,我们不难发现,张商英任地方官、台谏官、执政官这样几种不同的职务,主导了他五十多年的仕宦生活。尽管张商英多次领有京官任职,但是留京的时间相当短暂,绝大多数时间奔走于地方任职;他有限的台谏生涯展示了其独立不倚的人格;仅仅一年多的右相任期,其“拨乱反正”的施政举措,使他声名鹊起,按照《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②的说法,张商英曾经的执政经历,并无“不仁”,而且多有振衰起弊之举,映现出他的历史价值。张商英履职的不同方域、不同职事以及官阶的升沉替变,昭示他数十年宦海的艰难困苦,并铸就他“蜀中贤相”的历史功勋。

第三节 张商英的政治倾向

一、从张商英与新党的关系来考察其政治倾向

北宋文人士大夫因论议政事意见分歧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相互争斗,是为党争。其可以追溯到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所代表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1097页。

② 《孟子》卷七“离娄上”,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7页。

的变法派整肃吏治,与以吕夷简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为“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逐义”与“逐利”等事展开争论,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但庆历新政的迅速夭折,使这一论争没有深入。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中心的熙丰新政,围绕着变法与废法,又分别结成新旧两党,随后的元祐更化、崇观绍述时期,新旧两党之间的冲突更趋激烈,主导着北宋后期的政治表现形态,于北宋覆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北宋党争的实质,前贤已有相当多的分析。一方面源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倾轧;另一方面,宋代皇室祖宗之法“异论相搅”^①,该传统是皇室维持皇权牵制大臣的系统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新旧党争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北宋新旧党争交织着多方利益关系,我们不能以某种平面思维去理解这样繁复的系列历史事件。当然,张商英与新旧党争的关系也很复杂,这必然影响到他的政治倾向^②。

要论张商英的政治倾向,首先就要具体分析张商英与新党的关系。

熙丰新旧两党的争夺是全方位的,其中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台谏之争。沈松勤这样表述:“熙宁二年至四年,是王安石新法实施之始,也是新旧党争的序幕。新旧两党对台谏的控制与反控制,则是这一序幕中的重要节目;属于旧党的台谏由于‘争之有太过’,率先起了催化作用。”^③王安石的新法在实施中受到旧党的百般阻挠,他对旧党的忍让被旧党视作软弱,因而被迫起用新进少年来推行新法。旧党过高估计

① 宋真宗曾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78页)

② 张商英的政治倾向或许与其兄张唐英有一定的关系,当年张唐英举荐王安石改革政局,“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独荐王安石为可咎”(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06页)。章惇举荐张商英,固然与张商英的优异表现有关,“惇肆意大言,商英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为上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五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1095页),但不能说与张唐英没有一点联系。

③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